从开放-封闭到人化-物化

——论资本的文化逻辑

刘志洪　牛思琦

摘要：开放作为资本操控文化的起点，既是资本增殖的手段，也是文化维系的根本。但表层的开放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封闭，这是资本文化逻辑更为本质的向度。封闭性形成以资本为主导的文化利益闭环，加剧异质文化间的断裂，促使“超文化”生成，使文化呈现出生产的非需求性、交换的非平等性、分配的非均衡性和消费的非自主性，强化资本的权力。开放走向人化而封闭导致物化。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矛盾，解放与奴役、自由与束缚的矛盾，社会关系优化与退化的矛盾，都强化了资本宰制下人化和物化的界分。在宏观上把握文化开放与封闭间的张力，中观上注重文化建设中人文精神的养成，微观上将家庭关系作为生成社会关系完整性的基础，有助于驾驭进而超越资本的文化逻辑。

关键词：资本　文化逻辑　资本全球化　文化全球化　开放

文化逻辑是晚期资本主义最引人注目的逻辑形态之一。随着资本成为统治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力量，其作为“普照之光”渗透进而贯穿于人、社会和自然的方方面面。文化一开始不过是资本统治的一隅。但随着统治的运演，文化越来越成为资本增殖的高级载体。资本与文化发生了丰富而复杂的耦合效应：资本形塑、规约文化，文化映照资本，二者互为表里，建构了当代文明的整体风貌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，“逻辑”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、秩序、法则等，是一种必然性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。资本的文化逻辑即资本控制下文化生成、存在、演化的必然性，或精神观念中所映射的资本运动规律。

从开放和封闭的视角反思资本控制文化的生成进路，厘清文化运演的作用指向，是研究资本与文化的关系，进而在文化建设中超越资本逻辑的有效路径。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层面或某一指向的具体作用，或以现代性和世俗化为考察背景，关注文化开放与封闭的辩证关系；[①]或以文化的衍变过程

① 参见张容南：《封闭抑或开放：世俗时代的选择难题》，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》2013 年第 5 期。在作者看来，资本主义造成现代性的兴起和世俗化的进程，产生了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文化观念，将人类置于一种封闭的内在框架之中，并由此导致现代人的精神危机，人类及其文化在封闭与开放之间面临着选择。

〔**基金项目**〕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资本逻辑基础理论问题的哲学研究”（编号：17CZX004）和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“资本逻辑的系统结构及其当代变化研究”（编号：2017M620082）阶段性成果。

［**收稿日期**］2018-06-14

［**作者简介**］刘志洪，哲学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师博士后，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。　北京　100872

牛思琦，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。　北京　100144

为视角，作学理化分析，提炼出人化与物化的变化路径；[①] 或着眼现实发展，提出当代资本主义“从经济‘物化’到心灵‘支配’”[②]，“意识形态的‘物’化与‘物’的意识形态化”[③] 等观点。但这些研究尚未触及开放-封闭与人化-物化之间的联系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敞开这两个层面间的关联，更为深入地审视资本支配下文化所呈现的四重指向。

一、开放：资本文化逻辑的起点

探寻资本文化逻辑的起点，构成研究该问题的前提。通常意义上，这种考察或奠基有两条进路：一是系统论的方式，即利用怀疑与批判找到一个逻辑支点，并以此支点为原点，通过推导与演绎得出相应论断，展开一系列工作，相关论断及后续工作的有效性取决于支点的确证性；二是生成论的方式，即通过历史回溯，找到一个可以从头开始的原初点，这既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点，又是以此来分析和评价之后人类历史现象（包括文化现象）的参照点。比较起来，系统论的奠基方式存有极大风险，它受到的最大质疑来自对逻辑支点的不信任。而生成论的奠基方式依照历史逻辑进行，因其客观性而较少思维上的纠偏。对于资本文化逻辑的研究，两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均适用，但两相结合会有更好的效果。从系统论和生成论的双重维度看，这个既是逻辑支点又是历史原点的结合点，更是研究资本文化逻辑的起点。这个起点是开放。

于资本而言，开放是增殖的手段。从一般性上考量的资本的开放，是指资本之世界运行逻辑，即通过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获取尽可能广阔的增殖空间。在通过开放拓展增殖空间的过程中，资本由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存在，最终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存在。起初，这种开放只是单纯的经济行为，因为资本仅仅是在谋求增殖价值的经济利益，这就是普遍所言的“经济全球化”，即资金、技术、管理等器物性存在在全球范围的配置。但经济行为绝非一种简单的生产劳作事件，基于经济活动之上的文化活动也会被包括其中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经济的、文化的、器物性或制度性的因素结合在一起，建构出一个看似有“理性”的社会文化体系时，作为原动力的资本也就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。确切地说，是开放使资本获得了在全球范围存在的合理性，让它拥有了长盛不衰的生命力。这也就可以解释，尽管遭遇了当前反全球化浪潮的有力抵制，但全球化仍旧是现代不可否认的基本特征，是现代化的主流。进而言之，在资本获得在全球范围存在的合理性的过程中，文化是关键一环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文化全球化是比经济全球化更为深入的层级，它意味着真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。

究其本质而言，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，文化全球化实则是资本逻辑在文化上的展开。文化全球化是一种以开放为指向的文化生长。开放提供了资本扩张和资本文化逻辑生存的空间。这引出了开放的另一重含义，即资本增殖方式的革新。从工业资本、商业资本、生息资本等到文化资本、社会资本、金融资本的演进，资本形态处于不断变幻中。文化资本是当代资本增殖的一个重要形态。但资本与文化的融合渐进并非当代的产物。一个半世纪之前，马克思提出了“世界历史”和“世界文学”的概念，以将资本的“物质生产”和“精神生产”相联系。只不过当代以后，由于资本增殖的介入，开放力度增强，让这种融合变得更加紧密。

于文化而言，开放是其得以维系的根本。文化不是一种静止、封闭的实体性存在，它在传承中创新，在转化中发展。其实，“人类存在从本质上说，是不可避免的外在化活动。在外在化的过程中，

① 李鹏程：《文化衍变：外化、物化、异化、人化和内化》，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9 年第 3 期。

② 张一兵：《从经济“物化”到心灵的“支配”——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》，《求是学刊》1995 年第 4 期。

③ 王晓升：《意识形态的“物”化与“物”的意识形态化——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状况分析》，《哲学动态》2016 年第 12 期。

人向实在注入了意义。”[①]“外在化”即开放，它使文化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存在价值。从历史背景看，文化演进是一个渐趋开放的过程，表现为三个方面：首先，文化发展快速化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已经存在了数千年，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今只有几百年的历史，但这短短几百年却产生出了比之前更多的文化成果。究其原因，资本主义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，为维持自身生命，资本总是一刻不停地快速运转，不断进行文化的创造与整合，给下一轮扩张提供丰富文化资本。其次，文化样貌世界化。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，人们交往方式和社会联系的有限性使得人类的视域范围较为狭小，认识能力也受到局限，文化相对封闭，地域性成为其最明显的表征。资本的开放逻辑，一方面加强人类的“互相往来”与“互相依赖”，造就人类联系、社会关系的普遍与丰富，为“世界文化”的形成创造条件；另一方面，使得“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”[②]，在原有地域性文化的基础上生成世界性文化。最后，文化表达多元化。前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开放程度的有限与文化专制有关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，文化的规则往往“就是独裁政府的规则，这些规则指导人的任何一个行动，为他预先确定目标，并为他提供实现目标的手段”[③]。无论是文化的创造者还是接受者，都受到统一准则的约束，表达相对单一。资本敏锐地抓住这一点，以自由、包容来反抗文化专制，在已有文化形式之上不断拓展文化表达的样态，创造出多样的文化产品。

二、封闭：资本文化逻辑的另一面

但在资本宰制下，文化的开放亦是封闭，二者一体两面、两极相通。甚至可以认为，封闭是资本文化逻辑中隐藏于开放背后的更为本质的向度。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核心逻辑，它塑造了文化的开放，同时也是文化封闭的源头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，文化作为资本增殖的方式，资本实现了价值，文化得以生成、存续、发展。若与资本增殖相悖，文化要么被资本霸权消解，要么被改造或同化，最终呈现的只会是符合资本增殖需要的开放性文化样态。更进一步说，在资本的文化逻辑中，无论文化的原初样貌如何，或现阶段出现何种表层特征，都会为增殖价值的核心取向服务。所以，开放性恰恰是资本增殖这一封闭性的展现，在根本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封闭性。

资本文化逻辑的封闭性，形成了以资本为主导的文化利益闭环。在以资本为主体关系的社会中，文化本质上不再是精神活动而是资本活动。统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及其活动，不论是主体还是客体，无论是创造文化的一方还是接受文化的一方，“每个个人、每个消费者都被封闭于对商品的利益操控和为自身利益的符号中”[④]。然而，追逐现实利益的自我封闭，是文化退化的先兆。在这里，文化已失去它精神价值的“光环”，完全衍变成了维护资本利益的符号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资本的文化闭环在量上发展了文化，但在质上却贬抑了文化。所谓“文化的发展”，其“成果”也符合资本利益，甚至直接是资本利益的描画。

资本操控文化的利益闭环，加剧着异质文化间的断裂。在资本运动中，价值总是流向资本而非价值创造方，造成经济生活中的两极分化。在文化生活中，利益流向的不对等性同样存在。资本在传播文化的同时，迫使先进-落后、主导-从属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形态逐渐分离，并拉大差距。资本在整个社会运行中处于主导性和优先性的地位，文化始终朝着有利于资产者的方面发展，主动方愈发主动，被动方更加被动。简言之，文化断裂让资本文化占据主动，并愈加强大；大部分非资本文化处于被动地位，并愈加式微，以至陷入主体与依附的尖锐性、非等向关系。

---

① 彼得·贝格尔：《神圣的帷幕：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》，高师宁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35 页。

②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404 页。

③ 鲍德里亚：《生产之镜》，仰海峰译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131 页。

④ 安贝托·艾柯：《开放的作品》，刘儒庭译，中信出版社，2015 年，第 18 页。

资本文化与非资本文化的分化，促使“超文化”形成。“超文化”即占有绝对主导地位、享受绝对主动权的终极性主流文化，是资本文化的集中体现。正如马克思所说，资本主义“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，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”①。资本统治下的文化格局亦呈现出主导与从属关系。资本文化占据主导，发展成主体性文化，非资本文化处于从属，沦为依附性文化，造成两种异质文化间的断裂。主体文化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及资本利益，不断创造或改造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，但深层机理中隐藏的却是“文化殖民主义”的心态。主体文化在形式的变幻与多样中强化自身，文化虽表面分化本质上却渐趋归一。这是形成“凌驾”一切之上的文化的过程。从“超文化”的逻辑范式讲，绝对统治代表着同一化、齐一性，意味着相对性的丧失。眼下愈演愈烈的文化全球化、文化多元化实质上是文化的同质化，即文化逐渐同化的过程。

就现实而言，“超文化”的形成是当今世界文化格局的生动注释。西方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向他国输出文化，资本文化成为“超文化”的代名词。它瓦解了文化本应承载的“文以载道”价值传统，使之转而承担起资本的符号职能，变成了资本主义观念形态传布的工具。在文化渗透的过程中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掌握着国际文化秩序建构的话语权；发展中国家或难以构筑自己的话语体系，或只是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下，对资本主义强势话语权进行归附与另类诠释。最终，资本链条末端的国家在国际话语建设中罹患“集体失语症”。这一困局，在实践层面深化了资本的文化闭环效应。

上述资本文化逻辑的封闭特性，进一步巩固了资本的权力，即资本在社会中的支配力量。马克思说“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”②。伴随资本统治力的强化，资本权力的扩大与泛化，资本已“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”③。由经济权力到社会权力的延展，突显出资本文化权力的意义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占有了文化权力，才能使资本全部的力量关系真正发挥出来，完全掌控现代世界。换言之，也唯有实现由“经济帝国”到“文化帝国”的升华，完全地支配整个人类社会，资本才达到其权力巅峰，成为现代社会的“本体”。在文化权力拥有至高地位的“资本–文化帝国”中，文化权力不过是资本权力的映射，文化执行的是资本的职能，文化的表现形态即是资本的表现形态。因而，文化是资本的“文化化”或资本的“化身”，文化权力不过是资本权力的一环。资本文化权力的生发，有力支撑起文化的持续封闭。

资本对经济生活的统治贯穿于生产、交换、分配、消费的全过程。④ 同样，资本的文化权力也横亘于文化生产、文化交换、文化分配和文化消费的整个过程之中，并在各个环节都深度标注了文化的封闭性。

首先，文化生产的非需求性。不停地扩大再生产，是资本得以存续的重要基石。资本的文化逻辑也必须不折不扣贯彻之。为此，资本在文化生产中努力“创造一种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”⑤，这就使得生产的溢出效应在所难免，同时陷入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之中。换言之，文化生产受制于资本之本性，并非衡量供需关系之上的理性选择。或者说，正因为文化及其生产在整个生产方式的体系架构中居于顶层，从而资本的文化生产愈加呈现出无限扩大的趋向。但是，生产过程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约束力，即资本封闭性造就的文化封闭性。故而，文化生产更是在朝向文化同一化的“灰色”状态叠加，加深了虚假繁荣的生产幻象。

其次，文化交换的非平等性。在文化交换中，一方面，资本创造文化，但其不为创造者所用，而是被交换到资本回环的外围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交换为手段，向外倾销文化产品便是鲜明的例证；另一方面，非资本所创造的文化，无法向资本之文化体系输入，彻底失去了文化交换的能力。广大第

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505 页。

②⑤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30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49 页，第 589 页。

③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46 卷（上册），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217 页。

④ 刘志洪，王赢：《支配现代世界：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澄明》，《湖北社会科学》2016 年第 4 期。

三世界国家的“集体性失语”就体现着文化交换权由不对等而至弱化的过程。文化交换的这种不平等根源于文化生产。生产过多决定了文化交换的转嫁性，主导方要将结构内部的剩余产品转移出去，向体系外端的从属方输出，这是资本调整供需关系以规避危机的自纠机制，演映为上述第一个层面。生产过多还决定了文化交换的排他性。资本的文化体系内没有再容纳其他文化的空间，本就处于弱势的非资本文化不存在破门而入的可能，必然呈无力之势，即上述第二个层面。总之，文化交换的不平等是对文化封闭的又一层体认。

再次，文化分配的非均衡性。受不平等交换的影响，文化分配也展现出两种特征。一是文化发展水平两极分化。如前所述，资本的文化逻辑中存在主体-依附之矛盾关系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先期利用交换优势占据主导，发展成优势文化，矛盾的另一方则加速沦为弱势文化。两种文化的界分逐步拉大，文化利益分配不再等效均齐。二是文化组成的结构占比不协调。强大的资本逻辑总能先发制人，将多余文化产品强行分配出去，于是，形成一种偏斜的背反性局面：某些落后地区享有的资本文化并不在少数，在特定领域甚至比发达地区更多、更强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不是体系末端的落后地区主动选择的结果，而是由文化分配引发的被动接受，呈现出封闭逻辑的力度。

最后，文化消费的非自主性。消费本是人之生存与发展中主观自觉性的行为方式，可受思维、意识等人脑机能调控，让人在消费中得到主体自身的满足和提升。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，随着生产、交换、分配方式的改变，消费也发生了变异，它的“目的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人自身的需要，而是为了使资本获取更大的利润”①。换言之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，消费已不再被人所控制，而是被资本掌握，渐渐丢失了理性自主的内核，消费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作为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。“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”、“造成新的需要”、“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”② 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。受资本支配的文化消费，既是资本用以扩大和创造消费需求、拓展资本增殖空间的手段，其本身亦是资本增殖的重要空间。当代经济生活中强调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化趋势，便是为增大文化消费量的“包装”。

“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，这就是增殖自身，创造剩余价值，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。”③ 随着消费的完成、增殖的实现，被刺激扩大再生产，资本文化开始新一轮从生产到消费的权力统治。继而，在资本之文化权力统摄的内部，又形成一个封闭结构，让文化在封闭性桎梏中越陷越深。

三、人化-物化：资本文化逻辑的归宿

广义的文化即“人化”，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共识。然而，资本的文化逻辑，既具有开放的向度又内含封闭的特质，呈现出开放与封闭并置的特殊格局。资本统治下的文化总是面临与自身本质相类或相背的双重归宿。伴随资本文化逻辑的凯歌行进，由开放和封闭所促成的人化与物化的悖论愈发凸显。文化与人实质相通，而人在其现实性上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，对资本之文化逻辑的理解，可以从文化、人（人性）、社会关系三位一体的视域加以综合展开。资本的文化逻辑中充满辩证而繁复的矛盾，它以开放-封闭为起始，在通往人化-物化的道路中，出现诸多相反相成的具体矛盾，形塑了资本文化逻辑的作用旨归。

第一，于文化而言，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矛盾促成人化-物化之分异。人文精神是文化的题中之义，体现着文化的本质。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，都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性范畴，如泰勒在《原始

① 丰子义：《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09 年第 5 期。

②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30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388 页。

③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44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269 页。

文化》中将文化定义为“复杂的整体”，本尼迪克特在《文化模式》中强调“文化的整体意义”。如此，人文精神也必然显示出整合的属性，以呼应文化概念之内涵。然而，随着资本社会的发展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，而科学的理性精神讲求专业化，造成人类社会的种种分化，消减作为有机整体的人文精神。由此，在文化内部同时出现整合与分化的矛盾。

人文精神的整合性提升文化深度。创造性想象是文化整合与创新的重要环节。如赖特·米尔斯所言，“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，使人们能看清世事，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。”① 这种“想象力”在书中被赖特·米尔斯称为“心智品质”，实际也是一种人文精神。通过想象力的作用，人类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而加以考量，关注事件背后的普遍联系，进而建立起视角转换关系，从具体的、个别的浅层化思考，上升至对社会生活意义的总体性沉思。在深度“想象”的基础上，文化创造的视野和广度大大拓展，促进了文化发展；而文化的创新发展又为文化深度的进一步升华打下铺垫。

科学理性的分化性降解文化深度。科学品格与资本精神具有高度一致性，资本逻辑在价值增殖上锱铢必较的精算思维，与自然科学要经受实证检验、讲求确定的理性品格结合，深刻作用于现代文化的样貌。科学理性的这一特质造成了文化的分化意识，将整个文化体系划分为若干门类，各部分因分化而被人为贴上标签，使彼此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，仅仅关注重点领域及关键环节。就此，受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，文化的分化性让它与自身整全性的本质逐渐背离。对细枝末节的过分强调，像显微镜般深刻、细致观察事物的具体纹路，很容易忽视事件间的彼此联系，仅看到狭隘视域内的表象，实质上与真相渐行渐远。

分化性对文化深度的降解，造就文化的物化趋向。在资本和科学精神的规约下，固有文化被看作一个实证的、既定的存在，文化中的物化现象被当成自然事实。在这种物化意识的作用下，不仅仅外部各种类文化分离、内部文化属性断裂，更会导致总体性透视能力的消失，只能产生文化碎片。由于丧失了总体性透视能力，人类无法从整体上触及文化本质，也就看不到文化所连接的过去与未来，对未来的可能性蓝图缺失信心，成为物化结构中的人。质言之，人被文化的分化性、浅层性束缚，就是陷于物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。

第二，于人或人性而言，解放与奴役、自由与束缚的矛盾加深文化的人化-物化之界区。资本文化的开放逻辑促进人的解放与自由，实现人化；而资本的封闭逻辑使人遭受奴役与束缚，加重物化。

求知是人类解放与自由的重要源泉。文化在原点上可比喻为黑暗的“洞穴”②，其发展过程就是人类挣脱“洞穴”不断求知的过程。于本性上说，人总是一种好奇的生物，完整人性的获得必须超越已有文化，在求知欲的推动下开拓出新领域。基于此，与求知相伴的文化开放是构筑完整人性的通路。前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，求知的人类创造出丰富文化成果，为处于奴役状态中的人身解放奠定基础。相反，摒弃知识的“冷漠开放”③ 阻滞了探索的欲望，是人类自由之路的障碍。伴随资本统治的深入，其增殖逻辑生产出的过剩文化产品，消减了求知开放的欲望，并由此造成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封闭，成为诸多现实危机的根源。故而，求知向反求知的转换将文化推向“人化”的反面，促动“物化”因素的生成。

反求知衍生出文化的相对主义、虚无主义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求知是在找寻抵达真相的可能性，探索确定性是其真实目的；而反求知则无意于寻求真理，将事物的确定性不置可否。资本逻辑的反求

① 米尔斯：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，陈强等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1 年，第 9 页。

② 可以根据柏拉图的“洞穴”隐喻，将文化视为一个“洞穴”，人是黑暗洞穴中被捆住手脚的囚徒，获得的只是影像和回声中的虚假现实。若想获得人身发展与文化进步，应打开束缚在人身之上的镣铐，不再满足原有文化的狭隘范围。

③ 参见艾伦·布卢姆：《美国精神的封闭》，占旭英译，译林出版社，2007 年，导言第 16 页。书中将开放定义为两种形式，即“冷漠的开放”和“鼓励探索知识的开放”。

知倾向建立在资本文化的高度发达之上，即承认求知促进人化并造就了文化大发展。那么，人的“解放”与“自由”便为相对主义的确立带来保障。以自由主义和人性解放为名，人类可以进行不被施加任何干预的自主选择，让文化的确定性求知失去存在的前提与必要性。没有对错、是非、善恶之分，一切都是具有“确定性”的正确和至善；即使与真理相悖，只要掩饰得当也依然完美无瑕。缺少对知识的追求，使虚假得以大行其道，让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和虚无缥缈。至此，文化表面上呈现多元融合、包容共生的良性互动，其实是在朝同一化、均质化的方向滑落。

文化的相对与虚无加重本体之物化危机。价值选择上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文化表象，促使本体自身的文化与“人化”之本质渐趋脱离而出现“物化”之势。由于求知欲衰竭导致价值失范，人类失去了价值判断的理性标准，也丢掉了打破自身束缚的能力，造成文化内部之断裂。如若将文化简要分解为“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”与“人的本质力量异化”两种存在形式，当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不受任何约束之时，人本身的自然正当性皈依于基本物质欲望，人化向物化的靠拢让人无法走出现实物欲世界的自我封闭。人性的异化和人的整体性的丧失，深邃精神向度的消解，让非人化的异质性能量占据统治地位，文化向自然复归，文化价值中精神性的部分日渐减少。当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只剩下物质成分的时候，文化会最终倒退为本能或自然。

第三，于社会关系而言，优化与退化的矛盾构造文化的人化-物化之歧路。资本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，它在现代社会逐渐深入的过程，就是社会关系丰富与完善的进路。前资本主义社会中，人只是在“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”①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较为有限，社会关系相对单一，致使偏狭领域内的人身依附性加强。以此而论，人的依赖性正是对人化的束缚，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孤立、文化发展缓慢。与资本之开放性相伴，资本关系将人从以往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，使人的社会关系得到普遍性的发展。社会关系不断完善的进化之路，体认着资本支配现代世界的“变革”进程，也映照出文化之“人化”属向的增进。

资本在完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摧毁社会关系。确切地说，资本“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”②，天然地具有物的属性。在资本扩张中，固然创造出人与人丰富的社会联系，促进人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与文化进步，但这并不是资本的真实目的，而不过是资本运动的一个附属品，建立物的社会关系才是资本统治的归宿。为此，资本必须使社会关系破旧立新，“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、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”③，“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，除了冷酷无情的‘现金交易’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。”④ 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抛弃与新型“金钱关系”的确定，是资本改变社会关系的两个方面。

物化是资本控制社会关系的最终指向。资本攫取了现代世界的最高权力，表面上是人统治世间万物，内里则是资本作为物统治着一切，形成了资本社会中以物为主导的核心架构。资本的物化逻辑从根本上“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”⑤，人不过是资本或物的存在形式。进而，作为人本性体现的社会关系亦是资本衍化成的“符号”，并渐趋变成一种对立物生成，展现出与自身相异的特征。如马克思所言，“这是一个着了魔的、颠倒的、倒立着的世界”⑥，由物化乃至异化，社会关系→人→文化的运作机理，构成资本文化更为真切的样貌。

---

①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46 卷（上册），人民出版社，1979 年，第 104 页。

②⑥ 马克思：《资本论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2004 年，第 877-878 页，第 940 页。

③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274 页。

④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403 页。

⑤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3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282 页。

四、资本文化逻辑的实践启迪

对资本的文化逻辑的研究，不仅是为了从理论上使这种逻辑显露出来，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合理地对待和处理资本文化逻辑。从导控继而驾驭、超越资本逻辑的角度看，充分利用开放–人化的向度，妥善规避封闭–物化的缺陷，始终秉持对资本的超越，是引导现代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。对此，可从宏观、中观、微观三个层面系统考虑。

宏观上，把握文化开放与封闭间的张力。开放是资本逻辑的固有本性，也是资本运动的基本趋向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现实层面昭示了资本之开放性。在全球化进程中，关键是要在实践中把持开放的度，坚持适度开放，处理好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、现代与传统、时代性与民族性之关系，自觉培育适应时代需要、富有创造力的主体文化。空间上，要加强与他国优秀文化的交流互鉴。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，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，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多元融合的机会增多，应主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，以兼收并蓄、博采众长的心态汲取其有益因素，让他国文化（包括受资本统治的文化）的优秀基因在本民族文化的血液中相融共生。时间上，要深度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。传统文化诞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境遇中。让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衔接，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，完成资本逻辑统治之下文化的自我反拨与救赎，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。同时，无论是异国文化还是本民族文化，在开放吸纳之际也要有充分的自觉。一方面，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世界文化不可盲目接受、以洋为尊，要以批判思维辩证对待之，提升文化甄别能力；另一方面，针对传统文化热度的持续升温，切忌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归，防止过度复古。

中观上，注重文化建设中人文精神的养成。资本逻辑的理性化特质促进文化发展，但由理性化衍生的分化性也有消极的阻碍作用，造成文化碎片化与人文精神衰减。因此，亟须用人文精神提振文化深度。这是实践文化之本质内涵的理论路径。文化以人为本，人是文化的主体、文化活动的轴心，培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，着眼点应该在人。内在看，塑造健康人格是生成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之关键。只有充实人的精神世界，具有立足人性的终极关怀与深刻思想，主体人格才能在现实的“唯物质”冲击下保持定力，不沉湎感官欲望的占有。外在看，道德与法律的约束是人文精神得以存续之保障。文化的物化性使人呈现出不受任何限制的“自由”，在减弱道德与法制规约力的同时也消解着人文精神，因此，加强德法双重约制是树立现代人文精神的应有要旨。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，道德是内心的法律”，二者的相辅相成、互为补充构筑起人性的底线，促进文化良性发展。

微观上，以家庭关系作为生成社会关系完整性的基础。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。马克思、恩格斯曾特别指出，“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，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”①，以此揭示资本主义统治逻辑对家庭关系的改变。从资本简化、同化社会关系的逻辑出发，个人及文化完整性的建构，需以家庭关系的“恢复”为出发点，用优良家风和精神传承使被金钱侵蚀的家庭关系得到丰富与完善。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彰显的具体空间，家庭关系重构是社会关系健全的基础，社会关系因家庭关系的恢复而渐趋激发出活力的过程，也是人的本质得到回归的过程。从这个维度上说，当前需大力倡导良好家风家训的弘扬与承续，这是重建被资本异化的家庭关系，进而重塑文化整全性的必要条件。

（责任编辑：王云川）

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403 页。